

书 品

(2007年第3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学林忆往

傅璇琮 深受感召——记叶圣陶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办两件事

王勇忠 黄永年先生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购书札小记

专题书评

严绍澍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述

崔文印 功不负人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感怀

评书论学

白化文 读漆永祥著有关江藩三书

曾昭聪 品读《语文丛稿》

李裕民 点校本《皇朝编写纲目备要》读后

傅宇斌 忍寒庐词人书札的词学价值

——读《近代词人手札墨迹》

赵兴勤 戏曲史研究的创获

——评《宋金戏剧史稿》

范春义 术数研究的新收获

——读《古典术数文献论述稿》

聂鸿音 《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读后

涂耀威 读《钱基博年谱》

编撰摭谈

韩琦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出版感言

读书札记

伊强 《说苑校证》札记

刘玉红 《唐传奇笺证》订误

商榷篇

严晓星 《琴曲集成》提要补正(二则)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9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之一)

书苑撷英

吕澂、虞愚《因明纲要 因明学》 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 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 倪豪士《传记与小学——唐代文学比较论集》 杨泓《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2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深受感召

——记叶圣陶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办两件事

● 傅璇琮

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我在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读初中，当时就订购上海开明书店编印的《中学生》、《开明少年》两份杂志（月刊）。那时开明书店编辑部即由叶圣陶和夏丏尊两位出版界专家主持，这两份面对高中、初中学生的杂志也是叶、夏两位先生主办的。我经常阅读两位的文章，也读过他们的著作，深受教益，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影响很深。上世纪90年代初曾出版《叶圣陶文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当时我由于工作杂多，无缘拜读。但那时因偶然的时机，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静。今特追记于此，谨以自勉。

从1958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1959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720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于该年9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特地将这篇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该文篇幅不长，大约只有1200来字，由720字一张的稿纸誊写，共32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每个虚字、每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

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刼”，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劫”。最后一段原稿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老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年至1960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至希亮察。”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霁月，能使人胸中那一点灰渣尘屑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我想，社会上有些人，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黄永年先生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购书札小记

● 王勇忠

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籍版本、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就的学者和当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便发表了学术论文与陈寅恪先生相往还。永年先生还与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等多位大师有师生之谊，但他研究、讲授的东西又绝大多数和这几位先生不一样，“顾先生、童先生重点在先秦，我的重点在隋唐；童先生同时研究绘画、瓷器，我则研究版本、碑刻和书法；龙榆生先生研究诗词，我研究古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则怕闲人说我的成果是偷老师的，偷岳父（童书业先生——笔者注）的，另找一个领域便无此嫌疑；再则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永年先生纵横文史，在这些学科领域做出了引世人瞩目的贡献，尤其大邃于中古文史及版本目录、校勘文学，并精于书法、篆刻，为当代学界少有的通人。

永年先生自青年时期就开始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并且他一直都否认自己是藏书家，因为他“早年买书只是因为那时的书

便宜,还有一个原因是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对于买书,永年先生还自有一番高论:“过去真懂版本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干旧书业的,这是他们的饭碗子,一旦走眼,轻则自丢银两,重则倾家荡产,以如此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情从业,焉得不精?另一种则是读书人,有钱阔少如嘉业堂主刘承干之类还不行,大把的银子撒出去,由那些帮闲文人哄骗,所以所谓《嘉业堂山本书影》中就有若干假货。而只有读书人如我辈,囊中羞涩,没有几个大子来买书,还尽想买好书,挑来挑去,自然就精于此道了。”

黄先生购书的许多逸事在藏书界早已广为人知,但除在旧书店中亲自挑选古籍善本之外,永年先生年轻时函购图书的故事也颇有意思,现就笔者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今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黄先生的几封购书书信与大家共飨。

第一封信为永年先生于1947年7月4日所写。

敬启者:鄙人治明器之学,前于上海市博物馆友人处得知贵所刊有《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商承祚先生著,廿八年十月木刻本两册,刊贵所汇刊甲种中),备刊木明器制度甚详,渴欲一读,兹特来函问询,未知贵所此书尚有印本出售否?售价若干?如蒙示知,即当照汇请购一部也。又贵校所刊《金陵学报》复员后未知续有刊出否?乞将有关文史者之卷数、期数及售价一并示之,俾乃购买,为感!此致贵刊执事先生大鉴黄永年顿首七月四日。附邮盼复,赐示请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没过几天,永年先生就收到了索要的书目,他随即于7月8日再次写信给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

敬启者:承贵所赐寄书目二纸,谢谢!兹欲购(一)《长沙古物闻见记》(共二册,两万四千元);(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一卷(一册,两万四千元)。兹特附上五万五千元汇票一纸,内除书价四万八千元外,尚余七千元,未知足当邮费(请挂号)包装费否?请赐开发票。如不足,即当再寄邮票以补足之,如有余,则请暂存贵所,以待日后再购时算入可否?余不

一一。盼接到汇款后即将书(挂号)寄下,因急待参考用也。此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黄永年顿首七月八日。来件请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按照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员留在这封信上的记录,他们于7月11日寄出了黄先生所要购买的书籍,而永年先生亦很快收到了这些书,并于7月26日再次写信求购其他书籍。

敬启者:上次贵所寄下《长沙古物闻见记》等书早已收得,谢谢!兹欲再购贵所所刊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一册、第三卷一册、第四卷一册、第五卷一册,以上四册,照上次书单,共价八万元,兹特如数附上八万元邮汇一纸,至邮费包装费,则上次购书时尚存三千四百元于贵所(兹并将上次发票附上),想已够用。盼接信款后,将上列四册从速寄下,以便快读参考,为感。此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黄永年顿首七月廿六日。来信请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而这时由于货币贬值,《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每本涨到了50000元,而邮费和包装费也分别涨到了3750元和2000元,因此也就有了永年先生在7月30日的回信。

敬启者:来函诵悉,缺款自当照补,兹特附上四万两千元邮汇一纸,并附邮票三百五十元,盼将鄙人欲购书四册,即速寄下,以便快读,是感。此致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大鉴黄永年顿首七月三十日。

在这两次成功的购书后,永年先生于1948年初又一次向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函购书籍。

敬启者:兹欲购买贵所所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本,并《金陵学报》十卷一·二期。售价若干,望乞赐示。又贵所如有出版刊物目录,亦请赐寄一份以便选购,是感。此致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黄永年顿首一月二十五日。赐示乞迓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也很快回信告知他所购书籍

的价格。

迳启者：接本月廿五日大札，致悉《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一册价五万六千五百元，《金陵学报》十卷一·二期一册价十三万五千六百元（参看价目单），外加挂号邮资一万两千元（邮资多退少补），包装费四千元，合共廿万六千九百元整，即希将款汇下，当将书籍寄上不误。此致黄永年先生附价目单一纸 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地址：武进茭蒲巷五号永年先生在接信不久即将书款汇出，并附带书信一封。

迳启者：来示敬悉。兹特如数附上二十万邮汇一纸并邮票七千元，以购买贵所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及《金陵学报》十卷一·二期各一册，请即将此二书赐寄，以便参考，是感。此致金大文化研究所大鉴黄永年顿首 二月六日。来件请仍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遂在收信后的2月18号把书籍以挂号的方式寄出，而这时离永年先生来信已经过去了十二天，而他早已于17号寄出了一封信进行催促。

迳启者：前奉贵所来函后，即于二月六日寄上二十万元邮汇一纸及邮票七千元，以购买贵所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及《金陵学报》第十卷一·二期各一册，至今为时已逾十日，尚未接得来件，未知是否遗失？企待示知。如属尚未寄出，则请费神即速寄下，以急待参考故也。此致金大文化研究所执事先生大鉴黄永年顿首 二月十七日。来件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以上就是永年先生这几次购书经历，而由收件地址来看，永年先生当时应该正放假在家，购书不便，因此才有函购一事。通过这些，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当时函购书籍的一般过程，更重要的是深深地体会到了永年先生在青年时即有的那份对书籍的渴望与执着。而就在笔者写作这篇小文时，惊闻永年先生辞世的消息，故以它作为一份纪念，因为我相信在藏书、读书时的先生是最快乐的！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述

● 严绍璿

我本人在先师魏建功教授、杨晦教授、邓广铭教授等的教导下，长期从事于“日本中国学(汉学)”的学习和研究。1974年秋冬，承蒙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邀请，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我和我的同事们首次访问了日本，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奋和惆怅融合成难以名状的心情，於是便开始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十年之后即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客座教授。学术理念的提升，使我对汉籍的域外传播所内具的文化学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便把我试图较为全面地查考日本藏汉籍的设想开始付之实施。

我从文化史和现实的文化运作中愈益清醒地意识到，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理论阐发或文本解析，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是以原典的实证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的。人文学术中的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原典的实证”中站立起来的。一个称之为“学者”的文化人，如果一生中从未曾做过关于相关研究材料的发掘、整理与验证的工作，全凭接受各种时世的信号而空口说白话，那么，尽管有时候他也可能迎合某些群体的兴奋点“红极而紫”，也可能依靠当代愈来愈发达的媒体的无知和宝点而名扬天上地下，但他的所谓学术，在真实性和科学性诸方面上便大可怀疑了，而且命定日后一定会成为文化

垃圾,眼看着它们便无寿而终了。对像我这样一个从事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人来说,如果真的要阐明东亚文化的事实,并且从中获得具有科学意义的理性认识,若离开了像对“日藏汉籍”这样的基本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在相当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日后也难逃万劫不复成为文化垃圾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积累在心中的对人文学术的追求与悲哀,我便把对“日藏汉籍”的追踪和调研作为自己学术的基础。虽然从1989年下半年起我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转入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这件事情在我总体的时间分布中看起来好像变得有些“业余”了,但在自己的学术观念中,却愈来愈确立了它的基础性的地位。

随着我个人学术的推进,我似乎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域外汉籍文献而言,它们的世界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固然有其作为“文物”的价值,发现一本国内失传的典籍,犹如从国外以千万重金买回一尊鼎那样,让人赞叹不绝、惊羨不已。但是,域外汉籍最根本性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还在於它参与了接受国、接受民族、接受区域的文明的创造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参与异民族文明创造的历史轨迹和世界性价值,也只有在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关系互动的研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阐述;也只有在这样的学术阐述中,作为文献典籍的学术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因此我在日本藏汉籍的调查与整理中,十分留意考察文本传递的“文化语境”(CuhuralContext),尽量把握汉籍在日本列岛流布的学术图谱,注意日本相关文献中关于此本典籍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形态的记载,收集由汉籍传人而相应在日本国内产生的“文化变异”以及由此出现的“和刊本”和“日人写本”等物化标记,尽量摘记文本上留存的各种手识文,甚至中国商船输入时的卖出价与日本书商收购时的买人价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描述一部汉籍进入日本列岛而形成的文化氛围,由此而提示东传汉籍在日本列岛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的这样的做法,与传统的“目录学”的

著录就很不一样了,显得十分的“另类”。然而,这正是我从事“日藏汉籍”的学术理念的表达。我以二十年的时间和精力,追踪调研“日藏汉籍”,并把它们整理成可以运用的体系,首先是为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不移的基石。承蒙中华书局的好意,贡献於读者诸君的面前。读者诸君如果能够理解本书编著者这种力图把自己关于“跨文化研究”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的“目录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运作方式,并进而能够扩展学术视野,推进“跨学科”融通,进而能对自己的学术有所提示,这就是我的奢望了。我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中,开始我的“日本藏汉籍善本”的调查和研究的。

“日藏汉籍”的追踪和调研,确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业。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在异国独立进行的一个学术项目。从事这项工作,一是需要对日本自古至今的文化史包括它的文献史以及中国文献学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中日文化关系史需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二是需要在日本有相当长的停留时期,一年两年恐怕难以见效。三是需要熟悉日本近百个汉籍收藏机构,这其中有皇家的、公家的(中央的与地方的)、私人的(财团的与个人的)、学校的(国立的、公立的与私立的)、宗教的(佛教各宗的与神道教各派的)等,此事虽然充满乐趣却极为烦难。四是需要有足够的经费——在日本的许多藏书处观览藏书,包括“国宝”在内,确实都是“无料”(免费)的,但是,复印、制作胶片、收集相关的参考资料,往来於各地的交通与住宿费用等等,皆所需不菲。凭我个人的条件与能力,要具备这样四个基本条件,当然是十分的不容易。但是,当一个人有了一种明确的理念与目标之后,往往会有连自己都难以释然的精力去面对困难。

十数年间我在日本对汉籍追访的经历,留在了个人学术史上许多甘苦的回憶。例如,我曾历经多种烦难,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的提示下,经贝冢茂树教授的介绍,由狭间直树教授陪同,在羽田明教授主持下,终于在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中亲眼目睹了从我国流转於日本近百年的《说文解字》

唐人写本“木部”六叶。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四处寻觅而不得的“国宝”啊！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自控，虽然年纪不小了，走在路上却也觉得特别的轻松。我即刻把这一成果报告了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我的老师周祖谟教授，他在得到我的进一步的验证之后，便把这一发现写入了他正在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语言文字卷》了。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对自己劳碌辛苦的最大的安慰了。但是，十数年间，也有许多的苦涩曾经动摇过自己的学术的信念，记得在东京的“御茶之水图书馆”调查时，几经周折，约定了观书的日子。每一册善本从库房中出来，都需要我个人承担保险，一天大约在五千日圆之谱；中午不能停息，意味着不能吃饭。每天从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坐在四面被人看视而仅有两个人容量的玻璃书屋中，不吃午饭，也没有水喝，只有在洗手间中有自来水。我看一天的书，低一天的头。下午五点整把文献归还，走出大楼的玄关，没人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在火车站上，迎着夕阳，等待呼啸而来的列车，真是感到身心的疲乏。踏在细石铺垫的小路上，想到自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踟躅海外，面对茫茫的汉籍，何时了结！心情便变得沮丧起来。但到了晚上，拿出一天的记录，整理一天的所得，心情又豁然开朗，觉得付出竟是如此值得！第二天东方日出，阳光灿烂，不容细想，又踏上了观书之道。

二十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从日本的北海道到冲绳群岛，从太平洋之畔到日本海沿岸，我三十余回进出日本，追踪日本所藏汉籍善本的踪迹，已经获得了一万余种文本的资料（包括明代与明代之前的写本与刻本、活字本等。一种文本可能有数种或数十种相关的资料）。此数约占日本藏汉籍善本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以《四库》的编撰体系，编著成眼前的这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人文学界不知道从何时何地何人肇始，常常会冒出理论研究鄙薄文献研究，特别蔑视原典性实证研究的所谓“学术潮流”，常常会有一些中国文化底子很空洞而外文又识不得几个的先生，以“学术权威”和“理论大师”的架势，呼唤着

一帮无知小儿，云山雾罩般地抢占学术主流锋面，他们昨日里高声推销“欧美论说的普世主义”，今日间又高举“发现东方”的大旗，为电视报纸制造出一个个滑稽有趣的版面。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数十年间在不得已而观看这些学术闹剧的时候，除了欣赏他们的演技之外，于学术则深不以为然，并且更加督导自己应该以加倍的努力，从事於文献典籍的调研，致力於显彰“原典实证”的文化价值，以确保我国人文学术的尊严。二十年间，正是在这样的文献典籍追踪调研的基础上，我先后完成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史》、《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中国文化在日本》、《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等研究著作，并与日本文学会会长中西进教授共同主编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与日本思想学会会长源了圆教授共同主编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等。1994年11月7日，日本明仁天皇会见了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五位外国学者。我作为中国的人文学家有机会侧身其间，并与天皇陛下就中日（日中）文化的研究交谈了看法，其间，当我讲到汉籍文化对日本文化，例如对《古事记》和《万叶集》的影响和作用时，天皇陛下点头称是。1998年11月9日，我因为参加《中华文化志》中的《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的撰写，与十数位同行一起，受到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的特别亲切出接见。江泽民主席说：“你们为人民写了好书，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假如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层面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特定的学术领域中建立起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通道，那么，这无疑首先来自于我的“原典实证”的学术观念和长时间从事《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所获得的成果。

现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即将公刊，我对承担本书编辑出版的中华书局要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华书局作为一家名闻世界出版业的具有悠久历史和学术信誉的出版社，以二十年的时间，一直支援一项个人从事的学术项目，一直耐心地等待它的成功，表现了高

瞻的学术眼光和各位编辑的丰厚的学术修养。1985年中华书局的魏连科先生、陈抗先生等听到我正在开始做“日本藏汉籍”的调查时，便提出可以在中华书局立项，并很快得到中华书局学术与行政领导人李侃先生、邓经元先生和傅璇琮先生的认定。二十年间中华书局沧海桑田，高层领导几经变迁，历史编辑室主任也从魏连科先生相继传位谢方先生、张忱石先生、李解民先生、直到现在执政的冯宝志先生，他们每一位都对本书稿的进程给予了充分的关心，提供了全力的支援，对我数次推迟成稿，给予了十分宽容的理解。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稿的责任编辑崔文印编审，近二十年间他一直追踪本书稿的进行，无论编著者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始终与我保持着热切的联系，从书名、版页行格到内容的著录，他与编著者再三推敲，他用书信、电话与面谈的方式，十数年间留下了无数的辛劳的痕迹。他对我提供的这近四百万字的书稿，逐字扒梳，校其讹误，补其缺漏。有时候因为发现了文稿中的不可思议的错字（有些是电脑转换中的错讹），他把我找去，拍桌教训，怒不可遏。在本书三校清样校审之后，他又以数月时间通读全稿，核实引文，检出错讹。这种忠诚学术的拳拳之心，使我极为感动。

两年前，当我从中华书局接遇二校清样时，看到二十年间积累的涂满斑点的文稿已经面清目秀，不由得回忆起从五十年代至“文革”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和总编辑，同时兼任国务院古籍规划出版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金灿然先生的讲话。灿然先生说：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部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金灿然先生用这一生动的比喻所表现的对编辑这一职业的真切的崇高评价，一直深印在我的心中，当本《书录》得以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便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感谢中华书局的各位的。

当本《书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我国国家文史馆馆长启功老，欣然为本书稿题书了名签“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启功先生的题签有“竖式”和“横式”两条，说是为了将来出书时封面设计的方便。四十多年前我入北京大学之时，启功老曾在“中国文化史”课上马我们授课，先生虽然学识载五车，待人却平易关切如父辈。就像这次先生书写了两式名签那样，毫无名家的摆派，却处处为他人着想一样，指点着后辈的为人之道。

当本《书录》完成初稿之时，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老继愈先生，应编著者之请，欣然为本书作《序》。我在大学期间，任老曾经多次为我们授课。先生知识的丰富、学理的深邃和谈吐的幽默，启示了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和幼稚的心扉。近二十余年来，在许多文化学术活动中，多次与任老会面，总是惊羨先生思想的博识和敏锐。1996年6月，任老与我同在上海参加中国和日本联合举行的“东方文化会议”，便中我把正在进行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编著情况告诉了任老，深得先生的鼓励，并答应成稿之后为之撰《序》。现在，先生的《序》文已经撰定，语多奖掖，我把它看成是前辈学者对後辈的殷殷期望。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在新时代的条件中，理应不辜负了前辈的嘱托。

当本《书录》几经校合，即将正式付梓的前夕，我特别邀请我的老师袁行霈教授为本书作一《序》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叶我进北京大学读书时，听林庚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袁先生当时作为林先生的助教，与我们亲切相处。他每周必到我们宿舍一次。尽管当时的袁先生还极为年轻，在那样一个高呼口号的时代中，袁先生在谈吐中却处处透露出儒雅的修养，透露出他对于文学的深厚的“美”的感悟，在随意的交谈中释我疑难，启我心智，给我们以极深的印象。四十余年来在时代的风雨中，我们作为师生，共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无论环境作何种变化，先生始终乐观向上，而待人接物，则谦谦君子也。十数年来，袁先生作为“中国文学史”论坛的坛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真诚的执著之情，令

我神往；他又身居我国国家文史馆的领导、国家立法机关常务委员的要职而没有丝毫的架子，也令我感动。记得为了撰写和拍摄《中华文明》中的《中国文化在日本》这部片子，他数次给我电话，言辞恳切使我只能从命。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开始启动不久，袁先生即给我无私的帮助，他将自己在东京大学任教时亲手钞录的日藏唐人写本《王勃集》上的手识文提供给我，并给予诸多的鼓励。所以当本书稿付梓之时，我是一定要请袁先生作一《序》文的，除了表示对先生敬意，更要表达的是学代薪火相承之意。

日本当代汉籍研究的权威学者尾崎康教授也为本《书录》撰写了《序》。尾崎康教授一生致力於汉籍版本的研究，著作宏富。他沉埋於汉籍之中，皓首穷经。在当今的日本学术界，于“汉籍版本”这一研究而言，恐无有出先生之右者了。作为一位日本学者，他对于“汉文化”学术的执着，令我肃然起敬。先生一直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我阅於“日藏汉籍”调研工作的进展，始终给予了十分有力和亲切的支援。尾崎康先生为本《书录》所撰写的《序》文，生动地体现于中日两国的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解与合作。先生在《序》文中对军国主义表示的谴责，和对未来东亚和平的祈求，更令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所深深地感动的。

近二十年的寒窗辛苦，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学术界朋友们的诚意之中，终于结成了果实。可以告慰於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的年代里，终于把近两千年来流传於日本列岛的我国浩如烟海的汉籍文献，作了一次力所能及的梳理，大致把握了汉籍东传日本列岛的脉络和轨迹，掌握了汉籍善本在当今日本的流佈和收藏。诚如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大庭修教授所说，“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人做的事，现在却由中国学者完成了。”我感谢怀抱这样的公正之心所作的评价。从事於中国的、日本的和世界的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们，假如本书稿的著录，能够确实马他们提供学术所需要的文本钱索，建立起认识中国文化和东